

汉代神话史

HANDAISHENHUASHI

□黄震云 孙娟 / 著

这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两汉三国神话史著作，充分运用了出土的汉代竹帛石刻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汉代神话进行了全面归纳和深层解读，揭示了汉代神话直觉、传承、异态、适时等特点，总结出了汉代神话经过政治自觉出现的多态性及其神话体系的转型规律，进而又对神话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论证。文史一体，史论结合，对汉代神话进行了新的审美体系和范畴构建，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现代理论价值，显示出全面创新的风格特色。



长春出版社

汉代神话史

HUASHI

□ 黄震云 孙娟 / 著

长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神话史/黄震云,孙娟著.—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445-1165-0

I. 汉… II. ①黄… ②孙… III. 神话—文学史—中国—汉代 IV.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942 号

汉代神话史

著者:黄震云 孙娟

责任编辑:谢冰玉

封面设计:王国擎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编:130061

网址:www.cccbs.net

制版: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刷: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5.75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431-84940218

内容简介

这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两汉三国神话史著作,充分运用了出土的汉代竹帛石刻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汉代神话进行了全面归纳和深层解读,揭示了汉代神话直觉、传承、异态、适时等特点,总结出了汉代神话经过政治自觉出现的多态性及其神话体系的转型规律,进而又对神话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论证。文史一体,史论结合,对汉代神话进行了新的审美体系和范畴构建,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现代理论价值,显示出全面创新的风格特色。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一节	1
汉代神话概述	20世纪神话研究述评	
	第二节	18
	汉代神话的形态与形成规律	
第二章	第一节	30
汉代文学神话	汉代文学作品神话概述	
	第二节	30
	汉代诗歌神话	
	第三节	37
	汉赋神话	
	第四节	43
	汉代小说神话	
第三章	第一节	65
汉代学术著作神话(上)	社会学著作神话	
	第二节	102
	经学著作神话	
	第三节	126
	文化学著作神话	
第四章	第一节	147
汉代学术著作神话(下)	《史记》神话	
	第二节	184
	《汉书》神话	
	第三节	199
	《后汉书》神话	
	第四节	220
	《三国志》神话	
	第四节	233
	《东观汉纪》神话	

241	第六节 《吴越春秋》、《越绝书》神话	
258	第七节 《晏子春秋》神话	
262	第一节 墓主升天帛画	第五章 汉代帛画神话
266	第二节 绝地通天帛画	
277	第三节 太一出行等帛画	
279	第四节 夸父逐日和成仙帛画	
283	第一节 鲧禹治水神话传说	第六章 汉代画像石神话
299	第二节 西王母东王公和伏羲女娲神话传说	
311	第三节 孝行故事和儒家思想	
318	第四节 獬豸造型及其神话传说	
323	第五节 后羿嫦娥故事神话	
326	第六节 自然现象形象神话	
329	附录 中国神话研究目录(1902—2000年)	

第一章 汉代神话概述

第一节 20世纪神话研究述评

中国神话学是20世纪产生的学科。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繁荣发展的过程,在神话认知、研究、普及、开发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就整体情况而言,完全以神话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是很多,又由于神话和有关学科在区分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评估也不能过于乐观,需要继续做的事情还很多。因此,对20世纪的中国神话研究作一个初步的估计,对于今后的神话研究很有必要。

一、神话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一) 1900年至1919年的神话学研究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处于萌芽状态。研究者大多是经历了晚清王朝与辛亥革命,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关注西方文明成果。按其思想激进程度可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有蒋观云、夏曾佑、王国维、梁启超等;后者以鲁迅、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为代表。

改良派源于“康梁变法”,倡导文学的启蒙作用。蒋观云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指出“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的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①将神话研究与启迪民智的历史使命相结合。这是我国第一篇神话研究论文,标志着我国现代神话学的开始。与蒋观云并称“诗界三杰”的夏曾佑则从史学的角度首次提出:“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事实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②指出:“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羲、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并首次将进化论观点应用于神话研究,探寻神话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

^①蒋观云:《新民丛报》,《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

^②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年。

和经济条件。王国维是一代宗师，在哲学、文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也是楚辞专家。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比较细致地探索了南北方文学风格的不同及其对屈原文学精神形成的作用；收录在《观堂集林》^①中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说商颂》则从古文字学等角度涉及了神话学研究。

鲁迅、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派对古典文化的精通使他们不可能忽略中国神话的存在。同时他们大多留过学，善于吸收西方一些方法理论，因此，他们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深刻、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鲁迅对中国神话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早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②中就深刻地解释了神话的由来、性质及我们对它应该采取的态度。对于前者，他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地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到古异，淑诡可观”。对于后者，他说“虽信之（神话）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章太炎在《訄书》^③中用原始社会和母系制度以及图腾主义来解释中国古帝王感生神话之谜，并将地理观运用于神话来说明希腊、印度与中国三个临海的国家为什么会有有关浪涛龟鱼等形象的神话。刘师培在《古代阶级制度论》^④中引用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来解释产生古代感生神话的母系制度。他们这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示。

“五四”前的神话学研究，善于运用西方的方法和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神话，虽然这种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显得不够成熟，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同过去以考据、辨伪的研究方法相比，已经有了质的进步，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1919年至1949年的神话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神话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年至1930年）。主要学者有茅盾、鲁迅、周作人、顾颉刚、黄石、苏雪林、谢六逸、冯承钧等。他们更自觉地引入西方学术思维方式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理论，并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理论体系的构筑，使神话学摆脱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依附，有了独立的学科品格。

鲁迅首次把神话与传说作为专篇放进了《中国小说史略》^⑤（1923年）一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94年。

②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③ 章太炎：即章炳麟《訄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④ 刘师培：《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书里,这对于神话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周作人的《神话与传说》^①、《神话的辩护》^②对神话理论有着重大贡献,特别是《神话与传说》一文,论述了神话与传说、童话、故事的区别以及神话起源的五种学说,指出人类学派学说的合理性,并且指明了神话在文学意义上的价值。黄石的《神话研究》于1923年在《晓风周报》上连载,后于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单行本,这是我国第一部神话专著。谢六逸也于1928年推出他的神话理论著作《神话学 ABC》^③。在神话理论上早期成就杰出的当数茅盾先生,其《中国神话研究 ABC》^④(1929年)中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神话,标志着中国神话理论的形成。他得风气之先,较为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神话学的方法,以希腊、北欧等神话为参照系,初步描述、解剖了中国神话,整理出中国神话的系统,并说明了各自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还借助安德烈·兰的人类文化学的理论,通过以“取今以证古”的方法,了解到“原人”的心理特点,从而说明了神话的思维特点。顾颉刚秉承晚清学者疑古之风,又受西方史观和史学方法的影响,大胆对中国自夏以前的历史进行怀疑和否定,以图将神话、传说从古史中清理出来,提出了累层的历史观与民族神话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⑤以他为首的“古史辨”派,在20世纪20—40年代一直活跃在中国古史与神话传说研究领域里,影响很大。

在理论框架建构的同时,对具体神话作品的研究也得到初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质量有特色的文章。顾颉刚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⑥一文,从九个方面论证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人物,涉及文献学、文字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其厚实的学养和扎实的考证辨析成果即便对今天的神话学者也有重大影响。苏雪林信奉泛巴比伦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神话同源于古巴比伦。她的《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⑦联系中外神话、习俗、宗教仪式分类详述河神崇拜的原因及其祭典方式,探求其中的宗教因素以解九歌的原始内涵。视野开阔,具有开风气的功绩。其他有如赵景深的《太阳神话研究》^⑧、容肇祖的《二郎神

^①周作人:《神话与传说》,《自己的园地》,1923年。

^②周作人:《神话的辩护》,《晨报副刊》,1924年4月10日。

^③谢六逸:《神话学 ABC》,世界书局,1928年。

^④茅盾:《中国神话研究 ABC》,世界书局,1929年。

^⑤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3年第9期。

^⑥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读书杂志》,1923年第9期。

^⑦苏雪林:《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现代评论》,1928年第8期。

^⑧赵景深:《太阳神话研究》,《文学周报》,1928年5卷。

考》^①、卫聚贤的《穆天子研究》^②等。

第二阶段(1930至1937年)。由于早期的神话研究者大都由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转而涉及神话学研究。他们国学根基牢固,受传统考据风习影响很大,大部分务实而少作理论评述。这一阶段神话作品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成绩之一是《山海经》研究的突破,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③、吴晗的《〈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④、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⑤、卫聚贤的《〈山海经〉的研究》^⑥、高去寻的《〈山海经〉的新评说》^⑦等。《民》杂志1933年还推出《山海经》研究专题。对《山海经》的成书,作者时代以及所记载神话作了系统的研究。成绩之二便是对具体神话的研究,代表作为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1934年),以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辨析,阐述了中国水神神话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流变,得出这样三条结论:“一、水神传说的纷歧庞杂是‘不相同的时代地点,有它们相同的水灾和治水的人物’;二、‘不但四川神话移来江西,江西神话也有时移来四川’,所以长江一带的水神传说有相当的沟通痕迹;三、杨将军(二郎神)的威灵和神话的产生是因为有夔巫峡江的滩险。”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走在他研究者的前面。其他如黄石的《月的神话与传说》^⑧和《中国关于植物的神话传说》^⑨,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⑩,杨宽的《盘古传说试探》^⑪,郑振铎的《汤祷篇》^⑫,卫聚贤的《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的探源》^⑬,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⑭,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⑮等。学者们一方面运用西方的先进的学术方法和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传统的考据求证并且部分学者已经将神话研究与民间调查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的论著极具学术力量。

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9年)。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学者云集西南,以出

^①容肇祖:《二郎神考》,《民俗》,1929年61—62期。

^②卫聚贤:《穆天子研究》,《中大史语所周刊》,1929年5卷。

^③钟敬文:《〈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

^④吴晗:《〈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史学年报》,1931年第3期。

^⑤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1卷第4期。

^⑥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古史研究》,二集1934年。

^⑦高去寻:《〈山海经〉的新评说》,《禹贡》,1934年1卷第1期。

^⑧黄石:《月的神话与传说》,《北新》,1930年4卷第16期。

^⑨黄石:《中国关于植物的神话传说》,《青年界》,1932年2卷第2期。

^⑩钟敬文:《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3卷第1期。

^⑪杨宽:《盘古传说试探》,《光华大学半月刊》,1933年2卷第2期。

^⑫郑振铎:《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

^⑬卫聚贤:《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的探源》,《学艺》,1934年13卷第1期。

^⑭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⑮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民族杂志》,1937年5卷第1期。

色的成就促成了神话学研究的高潮。闻一多借助文献潜心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高唐神话传说之分析》、《朝云考》、《姜嫄履大人迹考》、《伏羲考》等论著是重要的神话学研究成果。闻一多在神话还原和重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以“弗洛伊德的性文化理论”解释远古“人种来源”神话内涵；依照弗雷泽的“交感巫术说”提出了“避害说”和“尊荣说”，来描述龙图腾的演化进程；用“以意逆之”的心理还原法揭开了“生民”神话的“面纱”。他既善于从小处着手，深入到每一具体神话的研究，又能从大处着眼，以宏观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气魄作论证，重视文化的系统性、整体性。

芮逸夫、凌纯声、吴泽霖、楚图南、常任侠、马长寿、陈国钧、马学良、岑家悟等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美术史学家等和文学研究专家将理论研究和田间作业相结合，不但拓宽了神话研究的范围，而且发现了许多未见记载的口传神话，对后世影响很大。常任侠的《重庆沙平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①和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②对闻一多的《伏羲考》有很大的启发。其他如吴泽霖的《苗族中的神话传说》^③，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④，陈志良的《始祖诞生与图腾主义》^⑤，陈国钧的《生苗的人祖神话》^⑥，马学良的《云南土民的神话》^⑦。

这一阶段古史与神话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顾颉刚、杨宽为首的“古史辨”派继续他们的古史考辨，尤其是杨宽将顾颉刚的观点加以发展，提出神话演变分化说，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会在大众的传述中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进一步完善了“古史辨”派的理论。他后来对孟姜女传说的论验证明了他的发现。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的出版是这一阶段神话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收获。但是“古史辨”的研究中存在着原始神话不可知论的局限，认识不到文献采集神话的时代和神话实际产生的时代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另一批学者如徐旭生、陈梦家、卫聚贤、吕思勉等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传疑时代”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神话学理论并与传统考据相结合。代表人物是徐旭生，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⑧可以认为是从历史角度对

①常任侠：《重庆沙平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学报·学灯》，1939年41—42期。

②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年1卷1期。

③吴泽霖：《苗族中的神话传说》，《社会研究》，1940年第1期。

④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

⑤陈志良：《始祖诞生与图腾主义》，《说文月刊》，1940—1941第2期合订本。

⑥陈国钧：《生苗的人祖神话》，《社会研究》，1941年第20期。

⑦马学良：《云南土民的神话》，《西南边疆》，1941年第12期。

⑧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

我国神话史研究的重要总结。无论是“古史辨”派还是其他的历史学家，他们都以严谨的学风、渊博的知识、细致的论证赋予神话学研究厚实的文化涵养。他们的研究使中国上古史神话资料的混乱状态大为改观。他们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鲜明民族特色，为建设中国神话学的独特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 1949 年至 1977 年的神话学研究

建国后，神话学研究处于低迷状态，成绩突出的是丁山、袁珂。刘大杰、于省吾、赵光贤、刘惠孙等人也有零星的文章发表。丁山了解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其《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①“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显示了深厚的小学功底。丁山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文学与比较神话学与宗教学，给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从而使得这部著作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从文献学广泛角度来说，其成就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如“姜嫄与土神”一节，不足 1500 字，引书 11 种，并结合古代风俗习惯，民族学知识推证姜嫄为土神，还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都有自己的见解，有时候也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性。

建国初期的神话学研究总体成就似远不如三四十年代。究其原因：一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指导，束缚了研究者的学术思想，阶级分析法成为唯一的研究武器；二为依照前苏联学界意见，把民间文学只作为纯粹的文学创作看待，即除了文艺学角度外，一般不从其他人文科学的角度去考察、探索。“文革”期间“破除封建迷信，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而与此有关联的神话学研究不能不受到冲击而处于近乎停滞状态。也有少量文章打着阶级斗争旗号的，如杨振汉的《一组有毒的神话：兼评袁珂同志的〈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一文》^②，其学术意义也就近乎有无之间。倒是考古学界，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大量文物的出土，为神话学研究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如马承源的《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③、《再论“大武舞戚”的图像》^④、金维诺的《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⑤等。

^①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店，1961 年。

^② 杨振汉：《一组有毒的神话：兼评袁珂同志的〈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一文》，《民间文学》，1968 年第 1 期。

^③ 马承源：《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考古》，1963 年第 10 期。

^④ 马承源：《再论“大武舞戚”的图像》，《考古》，1965 年第 8 期。

^⑤ 金维诺：《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四) 1977 年至 2000 年的神话学研究

新时期的神话学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巨大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7 年至 1981 年)。这是神话学研究在十年动乱后的复苏阶段。老一辈学者袁珂、杨堃、钟敬文、顾颉刚等再次焕发学术青春,以深厚的学识审视神话,是这一时期的主力军的主流倾向。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年学者厚积薄发,重新投入神话研究中,使神话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后势。1980 年袁珂校注的《山海经》出版是这一阶段的重大收获。《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典籍,里面收藏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但是几千年的传承,全书讹、脱、倒文等问题非常严重,影响了后世学者的研究进程,袁珂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山海经》进行全面校勘,恢复了该书的原始面貌,为神话研究者扫除了文本障碍。这一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实施,研究者还没有完全脱离“文革”的影响,研究方法总体上比较单一,对少数民族神话缺乏必要的关注。

第二阶段(1982 年至 1992 年)。这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发展繁荣阶段。老一辈学者中,袁珂先生以深厚的学识功底和杰出的成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这一阶段中年学者们显示了雄厚的学术能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以叶舒宪、徐华龙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神话研究者以勇猛的学术锐气,借鉴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方式,在神话领域形成了一道新的风景。这一时期重大事件有二。(1)袁珂先生提出“广义神话”概念,立即引起神话界的热烈反响与讨论,时间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尽管现在看来显得未必很有必要,但不可否认,争论的几年也是神话研究取得最大成就的几年。(2)1984 年中国神话学会的成立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件重大事件,它标志着神话学作为新兴边缘学科正式成立,标志着神话学研究正向科学化、体系化方向发展。此后全国神话讨论会的多次召开,在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在全国形成一股神话研究的热潮。据统计,仅 1980 年到 1990 年期间就有 800 多篇论文和 20 部神话著作出版。这一阶段由于国家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改革开放思想的深入人心,学者们加紧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学术方法和理论并与自己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使得神话学研究的水平大大超越了前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不可否认在神话学研究升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浮躁现象,某些地方只是 20 世纪 30 年代文化热的回应。

第三阶段(1993 年至 2000 年)。神话学研究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热潮以后,开始趋向平静。学者们在借鉴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更趋向

于传统的考据考古与田野考古工作的回归,如陈建宪的《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 443 篇异文的初步分析》^①。由于在方法上更多地熔铸了中西特点,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式,所以这一时期神话学研究在平静中继续向前发展。但是,随着老一辈学者的去世,目前神话研究领域没有领军人物,新时期登上学术舞台的中青年学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果受到质疑,毫无疑问,现在的神话学研究需要加强和发扬。

二、神话资料搜集和翻译介绍

(一) 资料搜集

对于神话学研究来说,资料的搜集是研究的前提,即便是纯理论研究,最终也要落实到具体神话资料上。20 世纪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社会急剧变化,使传统文化受到猛烈抨击,许多文化遗产面临消亡的危险,“整理国故”成为当务之急,而中国古代神话资料分布较为零散。因此,抢救、发掘、整理和保存神话资料成为神话研究者们首要的任务。

中国古代神话大都散布在古代各种典籍当中,是稀有的丰富,因此,整理古文献资料,从中搜集神话资料成为 20 世纪前期学者们的主要方法。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他们通过对“怀疑时代”历史文献的整理搜集了大量的古神话资料。茅盾则经过细心爬梳和认真清理,初步将古代神话分为六类,并且在清理的过程中提出了值得注意的,现在仍有价值的三个问题:一是关于一些古史如何还原为神话的问题;二是关于神话增生问题,同时注意到“西南的苗、瑶、僮各族,还有神话活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集之列”;三是关于灾异的迷信问题,指出“一方面固然和神话混淆不清,一方面也是变质的神话。这边一部材料,也须得很谨慎地特别处理”。^②其他如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神话进行了整理和搜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古籍中神话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是袁珂先生,他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神话资料的校勘、整理、编辑工作。出版了大量有关著作,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山海经〉校注》、《中国古代神话选释》、《中国神话史》等,不少

^① 陈建宪:《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 443 篇异文的初步分析》,《民间文学论坛》,1996 年第 3 期。

^②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 ABC》,世界书局,1929 年。

被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1988年）^①与谷德明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1987年）^②分别对汉族古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进行了搜集与整理。另外，1996年开始的由著名学者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对夏商周历史勘定整理的同时也清理出许多神话。

神话在早期是口传文学，除了典籍记载，民间流传也是神话存在的重要方式。“五四”前后，随着当时科学、民主与民族觉醒意识和浪潮兴起，人民口头文学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予以重视，不少学者认识到从民间搜集整理神话资料的重要性。特别是1920年前后，一批外国学者应邀来中国进行勘测与研究，无形中将实地调查的田野之风吹进了长期关闭的中国学者的书斋中。以后，在一批先驱者的热心推动下，经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及杭州民俗学会的拓展与壮大，形势生动。抗战前，我国民间文学如神话、传说等在探索、搜集、整理和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绩。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神话中包含着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科学，因此搜集、研究神话作品有着重大的文化史价值。所以，当抗战爆发后，随着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迁移到西南地区，一大批学者积极接触、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变化，通过田间作业，发现和记录、保存了一些少数民族神话。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③、凌纯声的《浙南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④、陈志良的《蛮俗札记》^⑤、常任侠的《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⑥、马绍房的《夷边的人祖神话》^⑦、马学良的《云南傈僳族（白夷）之神话》^⑧的著述中都有珍贵的少数民族神话资料。这些神话资料的搜集使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建国后，由于少数民族工作的需要，国家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开展了社会与文化普查，搜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口传神话。这时期参加调查的人数、被调查的地区、搜集到的神话资料的数量，都远非三四十年代可比。一些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如云南，素有“神话博物馆”之称，印出的民间文学集多达上百种，其中不少是神话。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活动又达到一次高潮。即

^①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②谷德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③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④凌纯声：《浙南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人类学集刊》，1939年第1卷第2期。

^⑤陈志良：《蛮俗札记》，《说文月刊》，1940—1941年第2期合订本。

^⑥常任侠：《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学报·学灯》，1939年第41—42期。

^⑦马绍房：《夷边的人祖神话》，《边疆》，1939年第39期。

^⑧马学良：《云南傈僳族（白夷）之神话》，《西南边疆》，1941年第12期。

各省、市、县编写地方志和编辑全国各地区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特别是后者被列入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之一，在文化部、国家民委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下，对全国各地进行拉网式的普查。采录、整理并出版了上千本各地民间故事集。据 1990 年的统计，已出版的民间故事达 183 万多篇，大量的神话传说被发现和记录下来。

另外，本世纪考古学一系列重大发现，以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画，东北发现的红山文化裸体女神像，河南濮阳发现的蚌塑中国第一龙以及东北、云南、宁夏等地区的岩画等。特别是大量的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中的神话的发现对中国神话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翻译介绍

现代神话学的建立离不开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引入，因此外来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最早给神话学研究以巨大震撼并且影响深远的当数 1895 年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介绍，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影响到蒋智由、鲁迅、茅盾、闻一多、顾颉刚等著名文化先驱。1913 年周作人在鲁迅编辑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童话略论》，首次提出要从民俗学角度进行神话研究，并且翻译介绍了古希腊神话《红星佚史》（1907 年），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单士厘的《归潜记》（1910 年）中的篇章如《章华庭四室》、《育斯》等介绍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对西方理论介绍的有：茅盾对安德烈·兰人类学观点的介绍，冯沅君对著名汉学家马伯乐的神话名著《书经中的神话》的翻译介绍（1927 年），谢六逸对西欧神话学的详细介绍，郑振铎对弗雷泽《金枝》等西方民俗学的介绍，林蕙祥对文化人类学的介绍，江绍原对宗教学的介绍，钟敬文对西方社会学的介绍，朱光潜对心理学和美学的介绍等。这些翻译介绍对 20 世纪 20 到 40 年代的神话学研究生产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我国神话研究处于封闭状态，除了借鉴一些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成了神话研究的唯一的指导思想和武器。相应地，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翻译介绍也停滞和阻隔下来。对外来民间文学资料的介绍也仅局限于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才重新开展起来。不可否认，20 世纪末神话学术的繁荣跟外来新的学术成果和方法的引入是分不开的，如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容格及其原型理论》等对神话原型理论翻译和介绍，魏庆征对前苏联学者神话研究成果的介绍，诸如《神话诗

学》、《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与神话》等,张铭远对《施密特的原始——神论》和大林太良的《神话史略》的翻译介绍。其他如董晓萍对美国学者欧达伟民俗学理论的介绍,陈建宪对美国学者阿兰·邓斯的民间文化理论的介绍,高历中对美国学者萨姆纳的论述的介绍等等。特别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80 年代推出《民间文学理论译丛》与《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丛书》,旨在系统地翻译介绍历代的特别是近代的外国各种民间文学流派的学者有关民间文学的论文、论著以及各个毗邻学科的学者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以满足国内文学界、文艺界借鉴的需要。其中不少涉及神话,如《民间文学理论译丛》第一册共 12 篇,其中 8 篇是关于神话学的。这些来自域外的研究和理论,使我们能够不断扩大视野、更新观念,促进中国神话学与国际神话学进行全方位的学术对话。同时也使我们知道中国神话学必须面向世界,只有在吸取全人类优秀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取得重大的飞跃。虽然 80 年代以来,翻译介绍取得突出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理论翻译的高要求,专门翻译人才的缺乏,从事这项工作的多为年轻人,要有大成,还需要采取措施大力加强培养和扶持。

三、研究成果

(一) 神话理论

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有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神话学是新诞生的边缘学科,因此有关神话理论的建立和完善一直是几代学者的共同任务。

涉及神话理论首选碰到的问题便是有关神话的定义和范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①对神话这一概念作了基本的界定。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神话的定义得到了肯定即“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都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本身”。^②从文艺学角度给神话下的定义,不适合于阶级社会产生的神话,为此,袁珂先生提出“广义神话论”将神话定义为“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年,第 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年。